

客家研究文丛

客家围屋

黄崇岳摇杨耀林摇著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 广州 ·

摇客家围屋轶闻，杨耀林著——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4年。

搖陽昇苑 緣圓懷 圓豐緣 远

摇Ⅰ 客...摇Ⅱ 掇①黄...②杨...摇Ⅲ 客家-民居-简介-梅州市摇
Ⅳ 掇①黄...②杨...摇Ⅲ 客家-民居-简介-梅州市摇

总发行：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广州五山华南理工大学5号楼，邮编510640）
发行部电话：(86) 020-77333333 (传真)
社址：广州五山华南理工大学5号楼

(平装) 四元

版权所有 摇盗版必究

第一章 摇客家围是客家物质与 摇精神文明的史诗摇

摇摇在闽、赣、粤客家人聚居地区，神奇地涌现出一座座圆形、方形、前方后圆等形式多样的客家围屋。它是客家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珍贵遗产，是客家民居最为精彩的代表作，是客家精神和文化凝固的史诗，值得我们欣赏和研究。

汉民族中的客家民系，是在汉民族传统的农业文明中孕育出来的。客家围是客家人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历经艰辛的长期迁徙，为适应新的自然和社会环境而创造出来的，比之中原的民居建筑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特点，全面体现出客家人的生产技术水平 and 精神文化面貌。俗语云：“文如其人”，我们是否也可以改为“屋如其人”？以往人们多从物质与技术层面上去研究客家围，可能导致“见物不见人”的状况。我们希望把物质与精神文化结合起来，“见物又见人”地认识客家围。

精神和文化渗透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精神和文化是各民族、民系生存与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客家人有古训：“打起精神来做人！”这是客家人挺直腰杆的人格尊严。那些由客家人创造，用血汗泪水和泥土砂石夯筑起来，雄伟壮观，傲然挺立，精美绝伦的客家围，是客家精神和文化的化身，闪耀着灿烂的光芒。

客家人历尽千辛万苦，在颠沛流离中成长。在中国历史上自魏晋以后，特别是唐宋以来，每当中原战乱或灾荒时期，便有部分汉族先民扶老携幼，跋涉数千里，跨越黄河、长江、赣江、汀江、梅江……一步一步先后南行，最后聚居于闽、赣、粤交界的山区，改天换地，艰苦开拓，落地生根，繁衍传播。他们既要在深山野地里开荒生产、建造家园，又要与当地土著畲、瑶等少数民族由斗争逐渐转为和谐融合，在保持汉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吸收某些少数民族文化精华，

于宋、元之际形成汉民族中具有语言、文化和心理特质的客家民系。他们在长期迁徙和山区定居生活中，形成了吃苦耐劳、开拓进取、包容开放、团结奋进的客家精神，敬祖睦宗、重教崇文、仁义礼智、颂诗放歌的客家文化。客家人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发展和荣辱休戚相关，客家人继承和发扬了中原文化的优良传统，不愧为中华民族移民群体中优秀的分支。其影响以闽、赣、粤为中心，遍及国内湘、桂、川、陕等省和港、台地区，远播东南亚和世界各地，声誉卓著。

建筑是生活和艺术的结晶、精神和文化凝固的史诗，是一个民族和民系的重要标识，是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具体象征。客家民居建筑的典型代表——客家围屋（简称客家围），是客家人长途跋涉、与时俱进的印记，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客家文化的载体。无论是建筑学家、历史学家、民族学家、民俗学家、社会学家或艺术家，均可从外到里，多角度、多层次地寻索出动人的篇章。我们要了解客家的历史源流、社会生活和人文精神，不能不深入田野，调查和研究封闭严密的客家围，它将诉说出让我们耳目一新的生动故事。

一、中原文化的传承

客家人“情系中原，根在河洛”，可以客家围作证。

聚族围居，是客家民系的重要特征之一。客家围，是多种多样客家民居中的典型。“伊伊围”已成为闽、赣、粤客家人对自己大屋的通称。所谓客家围，具体有“伊伊围”、“伊伊楼”、“伊伊第”、“伊伊世居”等称呼，是指那种四周封闭，以前门为主要出入口，有些还带有碉楼，用泥土或三合土（泥、灰、砂）夯筑，泥砖、卵石或青砖砌筑的防御性很强的大型客家民居。

客家围在不同地区还有不同的俗称：福建称“土楼”；江西称“土围子”；粤北称“四角楼”（或“伊角楼”）、“围”；粤东称“围龙屋”、“四角楼”、“围楼”；深、惠一带大都称“围”、“世居”。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客家围，继承了中原文化的传统，成为我们研究客家文化与中原文化关系的“活化石”。

（一）中原建筑文化的继承

走进南粤客家围，从外到里，我们仿佛触摸到一些汉族在中原地区还存在或已经失传与淡化了的文明传统。客家人“情系中原，根在河洛”已为学术界所共识。除族谱、语言和风俗习惯等种种证据外，我们认为府第式的围龙屋和四角楼等客家围，其建筑方法和形式，显然不是古代南越族，也不是后来的畲、苗、瑶族“干栏式”住房的传统，而是中原汉族的民居、庄园、坞壁和府第式建筑的传承。

中原地区在商周时期，就有成熟的土坯（泥砖）和夯筑技术，可以建造民居、宫殿和城池，至秦汉时期已有空前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东汉和魏晋时期，中原的封建庄园经济迅速发展，庄园主不仅拥有大量的土地和牛羊等生产资料，还组建自己的封建武装——部曲、家丁，修建起防御工事——坞壁。《后汉书·李章传》云：“时赵魏豪右往往屯聚。清河大姓赵纲遂于县界起坞壁、缮甲兵，为所在害。”当时董卓的郾坞，其墙高可与长安城相比。在中原和广州的东汉晚期墓葬中，均出土有陶坞建筑模型，“平面皆为方形，四周绕以高大的墙垣，前后各有大门，门上出挑梁以承门楼。四隅各有方形角楼”。^①由于中原地区战乱频繁，朝代更替，少数民族入主，汉族原有的经济、政治和血缘关系被打乱，失去了封建庄园和坞壁存在的社会基础，故至今在中原大地上很难见到类似这种带碉楼的古朴的坞壁建筑了。而历史上不断南迁的客家先民，却带着中原汉族的传统建筑文化，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于赣南、闽西、粤北、粤东和粤中的惠阳、深圳等客家地区，用夯土、土坯、卵石和青砖，建起一座座府第式的围龙屋和城堡式的四角围楼等客家围。他们以此表明自己是中原汉族的后裔。在考古学上，器物类比的认同，是文化和血缘认同的重要依据。

（二）聚族而居的躯壳

中原在东汉至魏晋时期，随着封建地主庄园经济的发展，以血缘

^① 孙机著《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100页。



为纽带的聚族而居的豪强势力日趋强大，阀阅功勋的门第观念十分突出。自魏晋时期由中原开始南迁的客家先民，带着中原文化和血缘聚居的传统，去开拓和适应南方的新生活，迎接自然和人文的新挑战。在深圳龙岗罗瑞合村罗氏围楼“鹤湖新居”的门楼牌坊上，镶嵌着石刻的“聚族於斯”四个字（不少客家大屋都有这样的题匾），说明客家围是血缘宗族的聚合，聚族而居的躯壳。每座客家围，大都是一个姓氏，由开基祖一直往下传。随着子孙的繁衍，客家围可以不断增加或扩大，通常采取两种形式：

一是另建新围屋。如深圳坑梓黄氏，二世祖振宗于乾隆十八年（~~乾隆~~1753年）建“新乔世居”，三世祖瑞瑛于乾隆三十六年（~~乾隆~~1771年）在大水湾建“龙湾世居”，四世祖迪元于乾隆后期在松子坑建“江夏堂”，五世祖维珍于嘉庆四年（~~嘉庆~~1799年）在坪山建“丰田世居”，六世祖奇纬于道光十七年（~~道光~~1837年）在坑梓建“龙田世居”，七世祖世福于咸丰四年（~~咸丰~~1854年）在老坑建“盘龙世居”。二是老围不断扩大。如粤东兴梅地区的围龙屋，随着同宗人口的增殖，可围绕堂屋一围又一围地增加横屋和后围（即“围龙”），从二横（一围）、四横（二围）、六横（三围）、八横（四围）至十横（五围）……而深圳地区的围楼，也可以扩建。如龙岗罗瑞合村罗氏“鹤湖新居”，就是瑞凤公于嘉庆二十二年（~~嘉庆~~1817年）先建内围“鹤湖新居”，有三堂、二横、一围、四碉楼、一望楼。以后子孙又在其外加建一围带四碉楼、一望楼，形成现存的三堂、二横、二围、八碉楼、二望楼的规模宏大的“鹤湖新居”。此外，瑞凤公的孙子息安（昔安）又于光绪七年（~~光绪~~1881年）新建一座“龙和世居”。可见客家人同一祖宗的子孙后代，增建新围或扩建老围，可因地制宜，自由选择。但无论增建或扩建都是随着人口的增加，适应“聚族而居”的需要。围居只是形式，聚族才是实质，用大围屋这个躯壳把血族成员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赖以生存和发展，这是客家围长期存在的社会基础。

（三）中原古代礼制的活化石

《礼记》云：“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古代礼制的核心是宗法制度。宗法之“宗”字上从“宀”，屋顶形，下从“示”，神主也，凡有神主的地方即为宗庙。宗法即宗庙之法。客家围正是民居与宗庙的

结合，上堂即为祖公堂，是最神圣的地方。因而，聚族而居的客家围，从形式到内容，综合起来就成为古代礼制的活化石。

在各种形式的客家围的中轴线上，大都建有祖公堂，即陈放祖公牌和祭祀祖先的地方，且一定是在上堂屋，这在围龙屋、堂横屋、四角楼和城堡式围楼中表现最为明显。祖公堂有精致的木雕神龛，里面按祖先的辈分自上而下陈列祖公牌位，自左至右则按“左昭右穆”的顺序排列，不得错乱。深圳龙岗区坑梓街道办松坪社区黄氏“江夏堂”祠联云：“尊祖敬宗萃百代冠裳如在，光前裕后衍万年昭穆无疆”此外，客家人也有专门的祠堂（宗庙），但祠堂也可以住人。

客家人逢年过节到宗庙或围屋上堂祭祖，是十分隆重的。要用“三牲”（猪、鱼、鸡）、各式糕点和水果等，子孙们穿戴整齐，烧香、点烛，读祭文，行跪拜礼。门口贴对联，放鞭炮。旧俗正月十五日元宵节，凡生男孩者要到祖公堂“上灯”（挂灯笼），现在不论生男生女均可去“上灯”，以示男女平等。正如《礼记》所云：“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这些仍活生生地体现在客家围的节日祭祀活动中。

在客家围所举行的婚、丧活动，同样遵循古代礼制的传统。解放前客家人结婚，大都按《仪礼·婚礼》行事，邀请媒人婆，听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经过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迎亲“六礼”。古代礼制除纳征用币帛外，其余五礼皆用雁，而南方无雁，客家人则用鸡代替。迎亲用锣鼓、音乐、花轿和盖头（罗帕）等均与中原无异。新娘进大门到上堂拜堂，也是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然后才入洞房，这也是中原的风俗。

客家人的丧事活动在围屋的上堂举行。孝子们穿白丧服，扶杖、披麻、戴孝、着草鞋等，也按《仪礼·丧服》所说：“丧服：斩衰裳，苴经、杖、绞带，冠绳纆，菅履者。”用棺材入殓，扬幡出殡，土葬。自始至终一如中原古代礼制。

聚族而居的客家人，一个围屋内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上千人，每逢岁时节日或红白好事活动，热闹非凡，同样继承中原传统。如春节祭祖拜年、舞龙舞狮，元宵放灯，清明扫墓，端午吃粽子、划龙舟，中秋赏月吃月饼，九九重阳登高，冬至吃汤丸等。它既有中原汉族节日文化共性，又有客家节日文化的个性。

由上述可见，无论是客家围建筑的方法和形式，或围绕着客家围开展的民俗文化活动，从中都可见源远流长的中原古代礼制的遗风。

（四）儒家思想的体现

客家围不仅是适应当地自然和社会环境，人们为生产、生活和繁衍的需要而建设起来的居住地，同时又是保留传统文化的宝库。自西汉王朝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便成为中原汉族以及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正统思想，即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我们走进客家围，到处都充满儒家思想文化的气息。进入深圳龙岗罗氏“鹤湖新居”的大门楼，迎面就是牌坊上石雕的“亲仁犹在”四个字，这正是儒家的“孝悌”、“仁爱”观念的反映。在粤北的四角楼和深圳的围楼中，不仅有中轴线上堂的祖公堂，而且在后围中间多见有龙厅或高于堂屋和碉楼的望楼（三至五层），在全围楼中占至高统领的地位，实际上是大家族的议事厅和学堂，让本姓宗族子弟在这里接受儒家的思想文化教育。粤北始兴县隘子镇著名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客家“满堂围”，其中间一座高于三层围楼“唯我独尊”的四层望楼，便是学堂，冠以“太子楼”的美称，可见客家人对儒家思想文化的渴求是多么的虔诚。

“耕读为本”、“学而优则仕”，是以往客家人的思想和行动的准则。许多客家围的大门口或祠堂前都树有功名碑（梅县俗称“旗杆石”），上面刻有“大清 伊伊年 伊伊科进士”等。在祖公堂上，则有“进士”、“魁元”等牌匾。这些都是张扬本姓氏家族有人夺得某种功名的标志，引导和鼓励弟子们为“金榜题名”、“光宗耀祖”而奋斗。所以，梅州客家到处流行“蟾蜍罗，咯咯咯，唔（不）读书，冇（无）老婆”的童谣，自小就教育小孩要努力读书。

客家围中的楹联，凝聚着客家文化的精华，是一种让客家子孙随时都看得见、摸得着的宣传标语，创造出一种处身立事的文化氛围。这些堂联内容广泛，主要有追根溯源、寻根问祖，显扬祖德、激励后生，艰苦创业、勤俭持家，乐观豁达、情操高尚，爱国爱家、报效祖国，等等，特别突出勤俭、孝悌和读书为本的精神。如广东兴宁市黄陂镇石氏“恭创围”祠联：“莫谓锦堂真富贵，男畏耕，女畏织，怠惰终须落下品；勿云茅屋无公卿，士劳心，农劳力，殷勤必定出人才”；兴宁市宁新镇大圳罗氏四角楼祖堂联：“家声不坠唯端品，壮志欲酬必读书”；广东鹤山县坪山镇罗氏以绢公堂联：“百世雍和修孝悌，一堂敦穆教读书”；深圳市龙岗罗瑞合村罗氏“鹤湖新居”堂

联：“慈孝友恭启迪后人昭世德，诗书礼乐缵承先诸振家声”；惠阳县镇隆镇大山下村“崇林世居”堂联：“所学诗书绵世泽，还期孝友振家声”；等等。综观客家围的对联，中原汉族传统文化——儒家思想贯穿始终，这是客家人对中原汉族文化传承的重要标志，也是南粤客家围屋成为传统文化宝库的重要内容。由此可见，客家围从外到内，从形式到内容，都是传统汉族文明继承的结晶。更为可贵的是，中原地区因历史和社会原因早已失传或淡化了的文化内涵，有不少可以在现存的客家围中找到，换句话说，一些汉族传统文化的精华还活生生地保留在客家围中。

（五）佛、道文化的反映

儒家文化、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除佛教文化为汉代从天竺（印度）传入外，儒、道皆为正宗的中原文化。客家人不仅从中原带来了儒家文化，同时也带来了佛教和道教文化。他们崇信儒、佛、道，同时又是崇拜祖先和崇拜自然的多神论者。这是客家人南迁后中原文化与当地的土著文化相融合，形成多元文化的反映。

在粤东客家的中心区梅县，佛教始于南北朝，盛行于唐朝五代，现存著名的阴那山“灵光寺”，就始建于唐朝。粤中客家地区博罗县罗浮山，是著名的道教圣地。客家地区不仅佛寺众多，道观也到处可见，人们还把佛、道教引入客家围内。有些客家围的祖公堂上，就有观音菩萨的画像或塑像，在祭祖的同时也拜观音。客家人在办丧事时，请在寺庙里侍佛的和尚（男）或斋嬷（女）来“做斋”，即念经超度亡灵。斋嬷住在寺庙吃斋（素）而不削发，与削发的尼姑不同。她们“做斋”时长发挽髻，一袭黑衣、黑裙，整齐清洁，光彩照人，边念、边唱、边跳，颇具神韵。这大概是由汉文化、楚文化和南越文化糅合而成的独特的客家佛教文化。

客家人对道教的崇拜，不仅表现在各地都有道观和道士，在家里还祭“先师”、贴符咒等，而且把阴阳八卦融合到客家民居建筑之中。我们在粤东饶平县饶洋镇赤棠村，发现有八角（八卦）形的詹氏圆土楼——“听捷楼”。此楼在清代出了九个进士，故有“八角九进士”的盛名。也有些客家围把八卦作为中堂顶上的藻井装饰。有的在建围屋时，用一块石板刻上金、木、水、火、土五个字，以“五行石”作为堂屋后花头（半月形）的勒脚石，起奠基的镇邪作



用。在客家围的门楼、厅堂或梁柱上，常有石雕、木刻或黄纸印的八卦图与太极图，基本图式有先天八卦、后天八卦、先天洛书八卦、后天洛书八卦、先天河图八卦、后天河图八卦和兽头八卦符等，请风水师或法师来安装，仪式隆重，以此作为镇邪护宅之用，祈求家族兴旺、生生不息。我们在粤北翁源县江尾镇长江村，还发现一处椭圆形的夯土、泥坯和青砖混合建筑——陈氏宗祠，俗称“簸箕围”，其平面结构为双环两堂。该围屋以祖堂为中心，由里向外辐射出 8 条巷，分别命名为甲、乙、巽、丙、丁、坤、庚、辛、乾、壬、癸、艮。这种把天干与八卦结合起来命名巷道的客家围，在我们调查过的几百座围屋中仅此一例。这无疑与道教文化的影响有关。

由上述可见，在客家风俗和观念中，对儒、佛、道教都同样崇拜，并将儒、佛、道文化互相融合，溶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是中原文化南播的又一明证。

（六）小农经济的基地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长期以来小农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它的特点一是自给自足，二是非常脆弱。这两个特点决定它在宗族和家族内部、个体家庭之间，要有某种互相帮助、互相补充的公共关系。每座客家大围屋，都是完整的自给自足的生产和生活体系。各家拥有自己的土地和生产工具，而大牲口和大农具在围屋内部可以互相租借。大门口有共同的晒谷的禾坪和养鱼的池塘，围屋内还有共同使用的水井，有可以互相使用的谷物加工工具——风车、碓、碓、磨等，甚至还有榨油和榨糖的大型工具。有些围屋内还建有学校，或以祠堂作学校，围内或围屋旁边建有厕所、猪圈等等。从生产、生活到文化教育，围屋的设施齐全，完全是一幅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活的图景。这是大围屋赖以长期存在的经济基础。

（七）滚动发展的营垒

客家围是客家人长期迁徙，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产物，是滚动发展的营垒。

客家人在历史上是一个迁徙和苦难的民系。每当中原或新居住地大动乱一次，客家人就要迁徙一次，社会政治状况是客家人迁徙的动

因。在历史上大都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农民起义或大灾荒等引起的客家先民的南迁。至清代又有因“迁海令”或“湖广填四川”等政治原因造成客家人第四次迁徙。从客家人的分布地域可知，他们居住的地方都是自然环境比较恶劣的山区，所谓“逢山必住客”。如在广东，客家人住在粤北、粤东的山区，而广府人住在富庶的珠江三角洲，福佬（潮州）人住在肥沃的韩江三角洲。客家人不仅面临穷山恶水的自然环境，而且面对新迁地的土著，其中有少数民族也有汉族，难免引起摩擦。所以，客家人在迁徙过程中要在新居地站稳脚跟，必须保持姓氏的宗族关系，以血缘关系团结起来，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为此，必须建筑便于聚族而居，且防御性极强的客家围。无论是闽西土楼、赣南土围子、粤东北的四角楼和围龙屋，以及惠阳、深圳地区的城堡式围楼，都有高大的围墙、围楼和碉楼，开有黑洞洞的枪眼，大门上镶着铁皮，门前装栅栏，门后装有门杠，门上还有注水洞口以防火攻……一座大围屋，就是一个小城堡，一个生息、防卫的营垒。

险恶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逼使客家人局促在一座大围屋中，只有围屋才使客家人具有安全感和获得生产生活上的自由。围屋是客家人文武结合、一张一弛、可攻可守以及滚动发展的营垒，其与中原古代的封建庄园和坞壁的关系是一目了然的。

（八）“风水宝地”——人与自然和谐的杰作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风水学是科学与迷信并存，复杂而神秘的一种文化。自古以来，人们无论是建房（阳宅）或修墓（阴宅），都喜欢寻求一块“风水宝地”。

客家先民自平坦辽阔的中原，几经迁徙到高温、多雨、多山、多水的南方地区，为了更好地生息繁衍，就把阴阳五行理论为依托的风水学加以发挥。明清时期，闽、粤、赣地区风水学极为盛行，凡建房或修墓，都要先请阴阳家——风水师踏勘风水的好坏，提供给主人选择。

风水师勘定村落、房屋或墓葬的地址，有觅龙、察砂、观水和点穴等一套方法。觅龙，即寻找龙脉，看山脉形势，察来龙去脉的盛衰吉凶。在山脉形势中，以秀润、端庄、逶曲、迂远者为吉，粗顽、干燥、破碎、直冲者为凶。村落和房屋的总坐向以负阴抱阳为佳，能与



山脉走向相一致，又能坐北朝南、依山傍水者为大吉顶好的风水。察砂，是观察主体山脉与四周的小山或护山的状况是否搭配和谐。“龙”与“砂”有如主与仆的关系，龙要雄壮高大，能遮风抗暴；砂要低矮圆润，能回风护气。观水，指观察水源来去的情形是否出入畅顺。客家人选择地基，把水源看得极为重要，要选择水源丰富而又能防涝的地方，便于农耕和日常生活。来水处谓之天门，天门宜开放；去水处谓之地户，地户宜封闭，以平缓或潜流为吉，所谓“开天门，闭地户”也。龙脉是风水的命脉，要尽力保护，而风水林则是保护龙脉的毛发，是村屋中藏风得水的关键。所以客家人的村落和房屋背后，都种植有禁止砍伐的风水林，郁郁葱葱、山清水秀是客家人追求的好风水和大景观。总之，客家人眼里的“风水宝地”，就是村落或房屋依山而建，负阴抱阳，前有平坦耕地，中间或周围有潺潺溪流。梅州地区典型的客家围龙屋，中间有方型的堂横屋，堂横屋后有高起的半月形的“花头”（阳），门前有半月形的池塘（阴），围屋后有大片风水林。花头与池塘两个半月形合起来就是一个圆。这样，客家围龙屋就符合天圆地方、阴阳和谐、天人合一的儒道的传统理念。如果我们剔除风水学中那些迷信和神秘的成分，就可见客家人在南方的生产与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科学观念。这也是中原传统的风水文化在客家的继承和发扬。

考察各地的客家围，建筑选址都非常讲究：主要选在靠山、近水和向阳的地方，有些还特地选在开阔的田野上。如粤东大埔县张弼士故居，是一座“花头”（化胎）变成长方形天街的围龙屋，其正面是宽广的田畴，后面是小河环绕，小河背后是一座青翠的大山，占尽了良田和山水的地利。又如翁源县江尾镇南坑村（又称湖心坝），以沈姓为主的整个村落都建在靠山面水有良田的地方，沈氏祖祠、椭圆形的祖屋——“长安围”，以及十余座沈氏子孙的各式客家围错落有致地排列。粤北翁源县南浦镇马山十村“楠杞楼”，依山而建，主楼方形，内围两堂，有四角碉楼；主楼后用围墙延伸到后山，拾级而上，山上的后墙上再建两个碉楼和一个望楼，居高临下；围墙后是一片郁郁葱葱参天松树；正门前一条曲折蜿蜒的小溪。我们站在正门前远处眺望，小溪、围楼、后山和大树（俗称风水林），高低错落，山水交融，既森严壁垒，又自然和谐，犹如人间仙境，可惜已经破败。粤北始兴县隘子镇著名的官氏“满堂围”，并列的三座“金包银”（外青砖内泥坯墙）围楼，就建在山水之间，因水边地基稀松，竟采用大

松木打桩和叠架的办法做地基，既结实又防水。可见客家人对山和水确是情有独钟，本是穷山恶水之地，也被改造为或被视为青山绿水加以歌颂。兴宁市合水镇溪唇练氏双层围龙屋的堂联写道：“左锋旗，右锋鼓，耸峙万载扶持御史堂；乌石寨，白石岭，高擎千秋保障封侯家”。蕉岭县淡定村丘逢甲故居“培远堂”楹联：“西枕庐峰，东朝玉笔，山水本多情，耕读渔樵俱适意；南腾天马，北渡仙桥，林泉皆胜境，同藏出处尽随心”。兴宁市罗岗镇袁氏“善述围”大门柱联：“青山不墨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对联是客家精神和客家文化的集中表现。上述几幅对联把客家人喜好山水、热爱自然、胸怀壮志、乐观豁达的高尚情操，表现得淋漓尽致。在科学昌明，强调环境保护、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今天，难道不应该从客家围的环境选择中得到应有的启示吗？

客家人来自中原，除有史书、族谱、民俗、地方志和考古材料等为证外，如果要拿实物证据的话，最有说服力的莫过于客家大围屋了。从它的建筑方法和形式，到丰富的社会和文化内涵，无不凝聚着中原的传统文化。它是一部“夯土的史书”，又是一座中原传统文化的宝库，可从中找到中原现存或已失落的华夏文明，很具研究和观光价值。

二、鲜明特色的建筑

民居是人类生息繁衍的场所，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原始社会人类有穴居、巢居、船居和屋居。进入文明社会的人类，以屋居为主，形式逐渐多样化，并受社会政治和礼仪的约束。因自然环境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不同的民族和民系有不同形式的民居，大同小异，或小同大异。我国是一个幅员广阔、民族众多的国家，自北至南，从东到西，由于自然条件、生活方式和民族与民系的文化背景不同，便产生了民居建筑的差异。如北方草原地区的蒙古等游牧民族，为适应寒冷、风沙和不断逐水草而居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便产生了圆形穹隆顶和可随时拆迁的“蒙古包”。中原地区以农耕为主和靠近政治中心的汉族，便产生了用泥土夯筑、土坯或青砖砌筑、带厅堂的府第式民居。古都北京除官宦之家建筑的府第外，百姓们多住小规模“四合院式”的民居，即建筑以方形庭院为中心，住房四周围合，与

客家围屋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它们主要是为冬天抗御风寒而建的低矮房子。陕西等黄土高原地区，因黄土具很大粘结性，有些百姓便因地制宜，挖窑洞居住，经济实用，冬暖夏凉。南方高温潮湿，在琼、桂、川、黔、云等山区的少数民族，自古以来便有住竹木构筑的“干栏式”住房的传统。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和民系的民居，都会显示出它的适应性和文化性。

笔者黄崇岳曾在中原和北京工作 15 年，并因工作需要跑遍除西藏以外的各个地区，目睹过不同地区和民族、民系的住房及风俗。但最令他惊奇和震撼的还是闽、赣、粤的客家围：从中既可看到中原的文化传统，又可见识客家人创造的鲜明特色，传统与创新相结合。

（一）精心选址

客家围是客家人生存和发展的基地，住址多选在有山有水的山区盆地或冲积平原上，有的依山而建，有的耸立在平原田野之间，尤以靠山面水、背阴向阳为佳。客家住屋讲究“风水”，剥去其迷信的外衣，实际上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自然美与人文美的统一。

（二）就地取材

客家围多为土木结构或砖木结构，围墙和隔墙主要用泥土或三合土（泥、砂、石灰或再加粘合物糯米糊等）夯筑，泥砖或青砖砌筑，或外青砖、里泥砖砌筑（俗称“金包银”），少数有下墙用卵石或条石垒筑，上墙用泥土或三合土夯筑者。所用土、砂、石灰、木皆就地取材，门前的池塘往往是挖土后的副产品，一举两得。客家民居不见全木结构，这是与畲、苗、瑶、黎等兄弟民族木房子截然不同的民居文化。

（三）规模宏大

客家围的占地面积一般都在一千平方米以上，多的达几千平方米，以至一二万平方米。如深圳龙岗地区的“鹤湖新居”和“大万世居”，占地面积达 15 万平方米，建筑占地面积达 5 万平方米，宛若城堡，可谓“客家围之最”。这是为适应宗族人口的发展而形成

的。

（四）布局严谨

客家围的布局，均按传统礼制，强调以祖祠为中心布局。方、圆“土楼”的祖祠位于楼内中心，围龙屋、堂横屋、四角楼和城堡式围楼的祖祠必定在中轴线堂屋的上堂，围村的祖祠安置在村内的中轴线上。其他配套设施也有定例，门前有池塘（月池）、禾坪，堂屋后有花头（或天街）、围龙（或后围楼），围龙中间有龙厅（或围楼中间有望楼）。不同类型的客家围，其平面可归纳为方、圆和前方后圆（如围龙屋）三种形式，前有月池，后有风水林（或山坡），符合天圆地方、阴阳五行的传统理念。

（五）通廊住房

无论哪种类型的客家围，主要都为“通廊式”的住房结构。房门面向堂屋或土楼中心的祖祠，表明人们对祖先的崇敬，以及家族、宗族内部的公共性与趋同性。但受广府、福佬文化影响而产生的单元式住房的客家围例外。

（六）功能齐全

客家围与单门独户的民居不同之处，就是集生产、生活、文化、教育和防御于一身。围内有加工农产品的风车、碓、碓、磨等工具，有公共水井、公共厕所，有库房，有饲养禽畜的圈，有学堂、书房，富豪望族甚至有花园和戏台，还有碉楼等等，功能齐全，是农业社会自然经济的缩影。

（七）防御坚固

高大的“土楼”，门坚墙厚，外墙不设窗户或高层只设可作防御性枪眼的小窗孔。四角楼和城堡式围楼均建有碉楼。围龙屋虽不见碉楼，但堂横屋和后围龙屋把房屋包得严严实实，内部的通道走廊四通八达，人口众多，一呼百应，盗寇亦难以侵犯。居住在山里而又不间断迁

徙的客家人，为防御盗匪、械斗和猛兽，可谓森严壁垒、众志成城。

（八）祠住合一

敬祖睦宗是客家遵循礼制，构建和谐社会的优良传统。在客家围的圆土楼和方土楼中，祖祠必须建在围楼的中心，住房绕祖祠布局，显示出祖宗的崇高地位和子孙们的向心力。在客家的“五凤楼”、围龙屋和堂横屋，祖祠必置于上堂，而半月楼则祖祠建在前端的中心，一排排的半月形住房绕祖祠后面而建。这种以祖祠为尊贵的祠住合一的客家民居，突出宗祖，突出以祖宗为中心“聚族而居”的“聚”字，是客家民居与广府和福佬民居重要区别之一。

（九）内涵丰富

雄伟壮观的客家围，被人们誉为“夯土的史书”、“立体的诗歌”，或可称为外刚内柔、外武内文的民居。客家围内有大量的绘画、雕塑、木刻和楹联等文学艺术作品，是传统文化的杰作，客家精神和客家文化的结晶，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品味。

（十）自然和谐

在历史上客家人长途跋涉，不断南迁，最后落脚于闽、粤、赣的山区。因为“珠三角”和“韩三角”的肥沃地带与出海口，早被广府人和福佬人占据了，居住在山区的客家人艰苦奋斗，努力将穷山恶水建成美丽的家园，在生产与生活的实践中，既改造自然，又适应自然，熏陶出热爱大自然的情怀。他们将客家围建造在青山绿水之间，没有青山绿水，也要人造出屋后风水林，屋前大榕树、大池塘，房屋与田园、林木、水池构成风光如画的美景。

客家围特色鲜明，外俊内秀，不只是中国建筑史上的奇观，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杰作，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完美结合。难怪不少有识之士赞叹之余，发出将其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呼声。

三、方圆变奏的韵律

客家人来自中原，信奉儒家思想，“天圆地方”、“天人合一”和“阴阳五行”的观念根深蒂固。在这种思想文化指导下，遇上相应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便在中原建筑传统的基础上，产生出以方圆为主体的形式多样的客家围。我们驱车闽西、赣南、粤北、粤东和粤中调查客家围时，蜿蜒曲折于青山绿水之间，走马观花，一幢幢方圆相连或相间的客家围，饰以白墙、黛瓦和红色门联，就像一串串鲜艳多彩的珍珠，一首首方圆高低变奏的乐曲。同时，它又像一座座森严壁垒的城堡。那文武相兼、刚柔相济的客家围，真可谓巧夺天工。

闽西客家围，素以用泥土夯筑的圆土楼（图 员）、方土楼和前低后高的府第式建筑“五凤楼”著称。尤其是被日本学者形容为“地上长出来的蘑菇”、“天上掉下来的飞碟”，或被美国军事情报部门神经过敏地误认为中国神秘的“导弹发射场”的圆土楼，越炒越热，世界知名。其实这种圆



图 员 福建南靖县螺坑村土楼群

形建筑，中国古代早已有之。早在五六千年前的陕西西安半坡和姜寨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就发现有半地穴式的以木条为骨架，敷上草拌泥作墙，屋内地面中有火塘的圆形、攒尖顶住房，以及村落中间有长方形的大型公共活动房，村周围有壕沟和哨所遗迹。这无疑是我们的祖先原始氏族部落“聚族而居”的反映。在河南的汉代墓葬中发现有用圆形粮仓作随葬品，只是带穹隆形的仓顶，与闽西天顶敞开的圆土楼有别。在河南洛阳亦发现有唐代大型半地穴式的圆形粮仓遗址。可见我们的祖先对圆形建筑早有经验。圆形建筑具有牢固和宽敞而省工的特点，故一直作为民居、仓储和庙坛（如北京的天坛）而存在，但像闽西客家圆土楼如此庞大和高层、防御性很强的民居建